



执“儒”行贾 “创”意不止

——也说徽商精神

□ 关堂所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行走古徽州，触动你最多的未必是山水绝美，而是人文深蕴：聚族而聚的古村落，儒学浸润的徽州人。而这一切，得益于千百年来从这里走向世界又始终心牵桑梓的徽州商人。翻阅史册，千古新安郡（今黟、歙、休宁、祁门、绩溪、婺源6县范围）先后经历三次人口移民潮，本是穷山恶林之地，却走出了中国第一大商帮：徽商。其发轫于两晋，活跃于两宋，全盛于明清，今日那些山水之间大大小小的财富与文化高度融合的村落就是无言却有力的历史明证。

中华商史上，徽商、潮商、晋商执华夏商帮之牛耳，而近代史上，唯徽商最盛。这与其“执儒行贾”的特色分不开的，徽商的文化素养在各地商帮中堪称第一，最终成就了明清史上“士商合流”的商界奇观，胡雪岩即为代表之一。

在汉口，徽商商会集聚之地谓之新安会馆，其中的文化意义超越商业本质，纵观全国徽商商会名称，多是文化味浓过商业味。徽商白天经商晚上读书，把庞大的商业帝国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之上，注重商业道德建设，这是其雄视天下的重要原因。史载从乾隆到嘉庆的70余年间，同样经营两淮盐务，徽商子弟265人读书入仕，同期晋商子弟入仕22人。这种看似“三心二意”的执儒行贾却换来了徽商的鼎盛，“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执儒行贾不仅表现在徽商在当时社会的长袖善舞，更多体现在徽商人博大长远的家国情怀上。今天，我们行走在古徽州，叹服于精美绝伦、体系完备的古村落，应该想到这正是徽商的家园情怀体现。退则回馈家乡、兴学扬善，出呢？则国家意识至上，匹夫担当可

我眼中的“徽骆驼”

□ 严太高

骆驼是比较常见的动物，以极能忍饥耐渴闻名，它可以在没有水的条件下生存3周，没有食物可生存一个月之久。由此，人们常把能忍受艰难困苦的人群称之为“骆驼”，纵横明清商界三百年的徽州商人因之被称作“徽骆驼”。

“无徽不成镇”。胡适在谈及他家乡古徽州时曾自豪地宣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家乡人，那个地方就只能是个村落。只有等到他的乡亲们住进来了，就把一个小村落变成一个小市镇了。“钻天洞庭遍地徽”，徽商位居“十大商帮之首”，这在明代晚期就成了人们的共识。

徽州多山，地少人稠，为了生存和发展，徽州人成年后大多纷纷离开家乡，外出经商谋生。《三言》、《二拍》对徽商描述甚多。最经典的数凌濛初：“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因是专重做商，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比起今天的温州人的经商意识，那时的徽商毫不逊色。

外出经商十分艰难，能成为巨商大贾者毕竟不多。因而，创业之初，囊中羞涩，不免节俭从事。给冯梦龙和凌濛初的印象是：俭吝喜名。《喻世明言》卷十八有古风一篇，单道为商的苦处：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偶然小恙卧床帟，乡关万里书谁寄？
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商旅劳顿不知道让多少徽州人客死他乡，所以成功的商人便十分看重这血汗钱的出处。放眼今日的徽州

赞。早期徽商不辞辛苦，运粮戍边，明中后期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近代徽商为抵外侮踊跃捐资捐物。1805年黄河淮河水灾泛滥，仅扬州徽商就捐大米6万石、白银2000万两。在济世救国的豪阔出手背后，是徽商人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不变传统。

别忘了在坚守儒家伦常、做大商业资本的同时，不懈创业、敢于创新也是徽商的显著特征。徽商人大多从小接受良好的家世教育，往往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中眼光独到、意志坚定。他们一般从小离家，多数像胡雪岩一样，从学徒做起，足迹遍及全国甚至东亚、西班牙等地，即使受到挫折，也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明清之时，经商成为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之巨，称其“万众创业”丝毫不为过。无论“徽骆驼”还是“绩溪牛”都是对徽商精神的总结和致敬，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是创业者的不二法宝。在创新方面，契约精神应该是徽商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凡事“立字为据”的做法曾让徽商一度受诟，但其中的契约精神和法治追求正是商业社会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另外，走遍全国、远渡重洋的商业开拓精神，商儒并行、利以义制的创新实践，对会票制、合股制、伙计制的创新完善，都是徽商为现代商业文明所准备的一堂堂不可或缺的启蒙课。

时代变迁，徽商再起。胡庆余堂、王致和、张小泉、同庆楼、胡玉美等百年徽商品牌，在现代商业框架下仍然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新徽商已在国际化背景下走得更远、更稳健。相信，再次光耀的徽商精神，于国于民仍是福祉所在！

大地，留下的牌坊林立，祠堂巍峨，学堂遍地，民居精致，道桥通达，这无不都是古徽商汗水的结晶。行商赚来的钱不仅大办公益，还要投资兴业，成为坐贾，由此成就了徽州一座座古镇村落。

重利轻义是商人身上给人印象最深的特质，这样的商人注定不能长久。反之，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的徽商，无疑是成功典范。究其成功之道，最明显特征在于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古代徽州素称“东南邹鲁”，“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其本质是儒商。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商人不仅具有坚韧进取的意志，诚信开明的胸怀，更具有立足长远的眼光，开放豁达的视野，协作竞争的风格，通权达变的机谋，以及好善乐施、崇文尚义的品质。

物质存在于一时，唯有文化可以延绵长久。所以，做人做事要永立不败之地，还得从培养人文精神做起。这，便是“徽骆驼”精神的启示。



传承徽商精神 创新社会治理

□ 吴猛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清。到了清朝中叶，徽商已跃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徽商所取得辉煌成就令世人瞩目，这与其在经商处世中所形成的徽商精神密不可分，而徽商精神的核心就是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开始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这与徽商的创新精神高度契合。

没有创新就没有徽商，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是徽商成功的法宝。徽商的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徽商思想观念上的创新。历史上的中国是封闭的农业社会，重农抑商观念使得商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普遍偏低。而徽商敢于打破封建正统观念，将商业作为主业，并且不再固守于自己家园，而是“几遍禹内，流寓四方”，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恰恰是徽商思想观念创新的表现。同样，创新社会治理首先也要创新思想观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沿用了这样的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这一个字的变化就说明我们党在社会建设方面上思想观念的创新，和传统的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更加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就要求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重经济轻社会”的观念向“经济社会并重”的观念转变，从政府“大包大揽”向政府、社会多元共治的观念转变。

徽商的创新精神其次体现在经营方式的创新。很多徽商都是由贩卖以茶叶为主的土特产逐步扩展到盐业、典当、纺织印染等行业，并打破“守株待兔”的经营方式，采取走贩、囤积、开张、质剂、回易五种方式并用的策略，从而创造了辉煌成就。创新社会治理也必须实现治理方式的创新，传统的社会管理实质上是上到下的管控，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手段，带来的后果就是政府过度干预，社会失去了活力，治理效率低下，因此必须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创新，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努力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自我调节、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徽商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其经营机制创新。徽商在经营过程中，并未拘泥于传统的家族式管理，而是灵活运用个人独资、合伙制以及类似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份制、合作制、经理委任制等多种经营机制和形式，这足以体现出徽商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社会治理创新也要做到治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面对日益尖锐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必须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要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要建立通畅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只有如此方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